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李心释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中的语言有“他性的自主”倾向,表现为“语言的历险”,一方面创造出新的具有延展性或多维的映射性的隐喻形式,一方面也暴露出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应当警惕。

关键词: 当代诗歌;语言观;诗学;语言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4)04-0052-07

一、朦胧诗以来西方语言观的影响脉络

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的“语言学转向”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莫过于语言观的改变,从此前的语言工具论或载体论转向了语言本体论,转向了对语言本身的关注对语言的本质的思考与探寻。语言成为文学自身的命题,不少文学作品直接表现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想、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关系,小说界有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论断,诗歌界有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的断言。这一语言观的转变带来的是“语词写作”^①,“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1]。但是“语言学转向”的来源是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学中的语言观本体论也有各种面目,两者虽非一一对应,却是有脉络可寻。

语言工具论的强大基础是语言指称外部世界的功能,朦胧诗的出现动摇了这一基础,它体现的语言观是,语义比指称更重要,语义可以相对自足存在。1980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语言理论上的有力支持,语言符号论思想彻底把指称物排除在语言之外,语义无须依靠指称,而是源自系统差异。朦胧诗之所以朦胧跟此语言观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诗人在语义实现的自由度上变大了,不再局限于语言对外在现实的指称,而更多地用语

言指涉内心世界。

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此后西方各种领域的语言理论在中国文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响。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思想是一种语言本体论的逻辑起点,即语言可以脱离对人的依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有结构、有系统的自足之物,那么文本语义的自足性自然就有了依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是另一种语言本体论的代表,它认为全部人类思想和实存的东西都以语言为条件,人的本质靠语言来定义,语言具有形成世界的威力,事先就将不同的存在之在连接在一起。这一语言本体论为中国文学中的种种语言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自从有了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与文学语言观不再有区分,“五四”白话文运动关于文学究竟用怎样的语言(白话/文言)来写,还谈不上是语言观问题,而属于文学语言观的争论;在罗兰·巴特、德里达、梅洛-庞蒂、萨特等人的文学研究著作中,语言观与文学语言观已变成同一个问题,或者说,不存在单独的文学语言观,像国内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一文就把语言观的革新同文学的改变直接联系起来^[2]。于坚引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作者特伦斯·霍克斯的话,来说明语言与诗歌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直接关联性质:“对任何诗歌来说,重要的不是诗人或读者对待现实的态度,而是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

收稿日期:2014-05-15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11BZW096)

作者简介:李心释,男,浙江瑞安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这语言被成功地表达的时候,它就把读者唤醒,使他看见语言的结构,并由此看到他的新‘世界’的结构。”^{[3]248}

狭义上的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实际上对我国文学界几乎没有影响,其主力人物卡尔纳普、塔斯基等人的影响只停留在哲学领域,倒是“语言学转向”后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蔓延到中国,大量出现在中国作家、批评家笔下的是尼采、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德里达、拉康、索绪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上述两种语言本体论构成了朦胧诗以来中国文学语言观的基本格局,但更直接的影响脉络则是如下三条,它们在第三代诗歌中的轨迹是相当明显的:第一是英美分析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观影响,其主张语言中的意义即用法、语言规则与语言游戏同时建立等,技艺派诗人就特别热衷于语言游戏,在诗歌中把语言玩得越来越精细;第二是存在主义哲学、德国解释学的影响,其对语言的诗性本质的强调无以复加,寻求在语言中的诗意栖居,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给中国诗人带来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极端反动,对“大诗”的追求,如海子、戈麦及其后继者;第三是法国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认为意义无限延异,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断裂,写诗不过是语言能指的滑动,语言可以玩,而没有任何建构的伦理负担。

二、当代诗人对现代语言观的接受与思考

以上三条脉络虽有各自典型的影响表现,但总的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影响,而是这三种路向的相互交织、交替催生,并且诗歌界对西方现代语言观的接受与消化有一个过程,比如“非非主义”初期受海德格尔对“常人”语言的批判影响,持“反语言”立场,过多地指认语言的遮蔽性,对“前文化语言”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后期才完整地领会海氏的“敞开/遮蔽”语言观,“作为存在的基本形式,语言一方面给不确定者以确定,一方面给确定者以不确定性。因而它既是遮蔽的,更是敞亮的。存在的全部晦暗和光明从语言开始到语言结束”^[4]。

接受西方现代语言观的背后同时还存在着对中国传统的道家语言观的重新发现^②,而重新发现的道家语言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小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对文化的怀疑,恰恰是从对语言的不信任开始的,“道可道,非常道”,语言总是不

完善的,常将人引入歧途,但诗人们跟老庄一样,把语言看作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因为除语言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只能用语言对抗语言,用语言超越语言。老庄对语言的态度是温和的,当代诗人则是激烈的老庄式,如“非非”成员诗人蓝马,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已变成一种文化的假相,人们一眼就把世界看成是“语义中的那样子”,而真正本源的宇宙只是一种“前文化”的存在状态,他说:“各种各样的风本身才是前文化语言、它本来没有语义,但确实又能使你知道无须言喻的那个东西。‘太阳’也是一样,它被约定来代表天上浮游的‘明晃晃的那东西’,作为‘明晃晃的那东西’表现着‘明晃晃的那东西’自己时,它所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种种表现就是前文化语言。”^[5]但他无法使用一种“前文化语言”来写诗,既暴露出他对现代语言学的无知,也反映了作为一种确定的“前文化语言”的虚幻性。后来“他们”诗派的于坚提出激烈的“反对隐喻”主张,提出“诗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对隐喻破坏得越彻底,诗越显出自身”^{[3]247},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诗歌天生是隐喻的,隐喻根本上也是诗性的^{[3]266},从这一矛盾推出的只能是他反对的不是隐喻,而是隐喻的隐喻,即成为语言暴力、被异化了的隐喻。从他饶舌的语言表现看,中国诗人的语言观已从貌似激烈的反抗语言或多或少地回复到老庄的智慧里。可见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语言观也是西方与本土文化基因相结合的产物。

作家、诗人对语言观的兴趣跟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比起关心语言的本质,他们更关心语言与人的关系。语言的概念在西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包括所有符号在内,语言作为最复杂的符号系统,成为整个符号世界的代表,狭义的语言仅指每一种自然语言。大多数时候,这两种概念在语言学专业之外不作区分。索绪尔有时候谈论语言似乎并不考虑语言之外还有其他符号的存在,如“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其中的“语言”可用“符号”来替换。语言与人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广义的语言或符号是人成为人的基本构成条件,人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只有通过语言或符号的创造,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获得自身的自由。卡西尔说:“他是如此的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借这些人为媒介物为中介,否则他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6]中

国作家、诗人几乎已把卡西尔的这一思想内化为一种语言观底色。综合索绪尔和卡西尔的看法,语言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特定的一种语言或符号系统就必定反映特定的观念体系,没有思想不是语言的,也没有语言不承载思想,那么正如部分诗人看到的,“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7]。也难怪人们对1836年写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8]的洪堡特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近,语言和精神任何纽带都是他们所乐见的。这些思想家使诗人懂得了语言与人的关系的重大性,使他们看到了语言是人的宿命,无法摆脱,但却可以创造与选择。比如,到今天我们才看明白,白话文中的欧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价值观、看待世界的视角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连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与象征系统也受到了影响^[9]。

中国作家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还有一条路径,他们无法接受索绪尔语言思想中对个体的排斥,作为个体的人与语言具有怎样的关系是他们思考的重心。这时又必须区分出另外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一种是与文化、思想同现的语言,后一种语言可称之为话语。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就一个,而汉语的话语形态却无限多,作为个体的人更多的是与话语发生关系。由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启示,或者中国文坛真实地存在话语权力之争,1980年代以来诗歌语言中有一种反抗神话、走马灯似的诗歌主张都高举“反”的旗帜,一边是将语言的地位抬高,甚至神化,一边是语言工具论的阴魂不散,把“语言”当作赢得话语权和声望的手段^[10]。说明1980年代诗歌界对“语言”的认识是异化的认识,反“语言”的声音总是顶着悖论的嘲笑落幕,声称要扭断语法的脖子诗歌,它们语法的脖子依旧坚不可摧;拒绝隐喻的诗人,隐喻的幽灵依旧牢牢盘踞在他们的作品里。今天的诗人们很难再将语言当作客体来对待或使用,人对语言的反抗是无望的,人与语言的关系并非主客体关系,而是循环关系,“语言并不发生在封闭的主体中,而后作为交流的手段在主体中流传,语言既不是主体的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它根本不在这种没有根据的区分范畴之内”^[11]。因此,那些对语言的反抗又悖论性地

回到语言之中,带来了多样表达与多样话语的可能性,实际上拓展了语言意识的疆域。

这两种思考最后促成了第三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他们认为朦胧诗基本上是用语言与存在的事物搏斗,而他们的诗歌写作则卷入与语言的搏斗,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写作本身^[12]。诗人们相信通过清除语言内陈旧的规约或语义污染,能够恢复独特的诗歌感受力,摆脱以往的写作对过去文学经验的依赖,实现主体、语言、原初生命体验同步入诗,使语言径自朝向对存在的敞开。

三、当代诗歌背后的语言观面貌

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文化输入的现代性,现代语言本体论来自西方的哲学文化土壤,未必适应中国的土壤,更不会一下子就能够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历经千年发展起来的诗歌意象理论所持的语言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倾向的,语言不过是立“象”的工具。诗歌中的“象”已不是王弼“言、意、象”之辩中的独立项,“意象”成为不可分割的美学单位,弃“象”得不到意,而弃“言”能得象,因为并不存在一个“言—象”单位,语言只是用来指称事物,事物本身独立于语言。诗歌的言志、言情也是我们的传统,语言的工具性自不待言。当代诗歌很难摆脱传统语言观,无意识的因循守旧,以及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新发现所带来的鼓励,都可能使诗人在诗歌写作中背离语言本体论的认识。语言本体论作为一项现代性革命的内容输入,它又必然以革命的工具面目出现,而悖论性地转向语言本体的工具论,当代诗歌的语言实验多数成为话语权力焦虑或文化政治观念的实现工具。这就是现代语言本体论在中国诗歌中的命运。

但是语言本体论意识的觉醒必然到来。朦胧诗对新的语言形式的追求并不来自对人与语言关系的新认识,仅仅是主体表达原有客观世界秩序破裂之后的经验的手段,正如叶维廉所说,“诗人一旦失去了这个‘存在的理由’和完整意义的依据,很自然地会摒除这个破碎不全的外在世界而转向内心世界,去追求新的价值、新的统一的意义。而这个试图以艺术的创造、文化的再现来重新肯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内在旅程,相应地要求他们寻出新的表达形式;这是辩证必然的过程,多义的意象只不过是他们语言手段之一而已”^{[13]274}。我们或许可以说,朦胧诗从极端的语言工具论(“人民的文学”)转向了一般的

语言工具论(“人的文学”),而不得不进入人与语言的循环关系之中,“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

这种寻找新语言的企图在小说中同样强烈,余华认为,“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它强行规定了事物的轮廓和形态。因此我寻找新语言的企图,是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14]。其中明显蕴含了第一种语言本体论观点,语言是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文学创作中语言无法逾越,只能用语言抵抗语言。虽然说朦胧诗用“意味”“感觉”等代替概念,是另一种语言工具观,但在朦胧诗中语言已获得独立的美学价值和内容价值。朦胧诗之后,诗人的语言意识从此成为诗人的基本素质了。

语言的发明性使语义、诗意与语言能指形式不可分离,形成“语象”单位^③。典型语象莫过于顾城《一代人》里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里“黑色的眼睛”虽然有所指称,但指称性明显减弱,因为人们无法离开这一诗句的语言形式,从指称中得到一个自明的意象,其诗意与语言形式同出,如皮肉不能剥离。所有的发明性语言都在创造语象,如“当全部黑暗俯下身来搜查一盏灯”(痖弦)不同于“黑夜”,“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洛夫)不同于“看见石壁上的两道槽”,从诗歌意义上看,前后的不同是根本性的。叶氏把语言的发明性限度定在“因语造境”,“一旦诗人过于重视语言,而变成‘因语造境’”,这是语言的走火入魔^{[13]269}。实际上指的是语言脱离了人与语言的循环圈,当语言的可能性不被人所体会时,它就是异化的存在,因为只有此在才可能将存在带出来。

事实上,当代诗歌中语言的发明性并没有走向节制,而是一脚迈进本体论:自主的语言。诗歌界在自由诗中对语言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很快抛弃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不再从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对立角度去思考文学,而直接思考语言的诗性,将诗歌语言直接理解为语言本身,“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它真正的意思是每一个词语都渴望成为诗”^④。语言从自身独立存在的自足性转到了与人直接相关的自主性,人把语言摆在了自己的上方。即便承认前一种语言本体论,人也仍然以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自居,只有到了后一种语言

本体论,人才会有真正求助于语言的谦卑。“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语言和现实是同一事体的正反面……语言是比现实更高的存在领域”^[14]，“语言的欢乐”必然越过“因语造境”的警戒线,当语言被认为高于现实的存在时,诗人自然有了充足的理由,在语言中游离于现实。

这一局面并不必然导致“因语造境”诗歌的泛滥,而使大量诗人学会了尊重语言,聆听语言,而不是驾驭语言。应该说,反而是驾驭语言更容易出现“因语造境”的诗歌。很少有诗人像余怒那样极端地主张“让语言自言自语”,臧棣将语言比作有灵性的蝴蝶^[15],哑石把诗歌视为“语言、灵魂同一的呼吸中具有自主性的生长之物”,清平认为语言与诗人是互相发现、互相教育的关系^[16],西渡认为“这一代诗人由此建立了一种语言的发现观,即通过对语言的倾听、观察和揣摩,去发现事物之间被日常的经验 and 逻辑所遮蔽的关系,揭示事物潜藏的诗意”^[17]。“语言的发现观”说明了当代诗歌已经完成了从语言的发明性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

四、“他性的自主”与虚弱的当代诗歌

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的语言还没有进入较为成熟的循环关系中,过去的语言工具论是割裂语言与人,不存在循环,是人在控制、奴役语言,现在是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人多少降为被动的接受者。这时,语言本体具有“他性的自主”特征,与处于良好的循环关系中的存在论语言相区别。在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文学批评观点中,语言就具有强“他性的自主”倾向,人总是被挟裹进语言自身衍义的漩涡。当代诗歌语言“他性的自主”是必不可少的阶段,曾有一段时期,当代诗人的诗歌中普遍出现以语言、诗歌本身为题材的自反性诗歌,这是语言本体论转向过程中的自然反应,说明他们对写作的生命最终维系在语言上有了很深的感触,预示着后来他们从独异的语言体验与语言方式中获得强大的诗歌写作驱动力。

“他性的自主”使当代诗歌从跟语言的搏斗变为顺应语言的引诱,进行语义的游戏。与语言搏斗是通过语言操作达到对日常或陈旧的语言规约用法的消解,这一生硬的、刚猛的做法往往造成得不偿失的局面,使诗意不能自然地到来,或产生越来越多空洞的所指,使诗意流失。顺应语言的引诱表现为诗人对词

语或语言组合、聚合特征的敏感,并顺势推进诗意的繁衍,可称为“语言的历险”。诗歌必然是隐喻的,诗歌写作一边清除过去的隐喻垃圾,一边创造新的隐喻形式,当代诗歌隐喻的特点非常明显,即要么具有延展性,要么具有多维的映射性,足以反映语言的历险特征。如黄梵的诗《蝙蝠给我画像》(节选):

一只蝙蝠撞上我的脸,又一只已经靠近
……
也许我浅色的脸,更像一个洞穴
它们要往里飞——

变得空洞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生活
到处都是可以的漏洞啊
无意间,被蝙蝠的回声逐一探出

以“蝙蝠撞上我的脸”作为铺垫,使“浅色的脸”自然转到“洞穴”,从“洞穴”到精神的“空洞”,从精神的“空洞”到生活的“漏洞”,也无不是沿一条语义之流顺势而下,并产生一个近乎完美的回流——“被蝙蝠的回声逐一探出”。这首诗的诗意完全取决于语言的引诱和语义的巧妙游戏,而一种新的“世界”的结构在其中展现了。再如臧棣《埃德加·斯诺墓前》(节选):

那一天:整个大自然像一部厚重的大词典
被我捧上膝头,风恰好掀开这一页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

“大词典”的比喻仅仅是个开始,是个铺垫,在这上面的任何停留都会错过真正的诗意。由“大词典”自然到可以“捧上膝头”,可以“被风掀开”,可以有“页”,可以阅读,可以看懂……这一延展里同样有一个完美的回流,即今天的埃德加·斯诺墓前就是大自然的这一页,“我”读懂了。

一个隐喻具有多维映射性在1990年代以来的叙事性诗歌表现得最为突出。叙事性诗歌不是叙事诗,它仍然在抒情诗的范畴里,但其中的叙事性成分却能够很好地破坏语词隐喻意义的板结和乌托邦的情绪,使语言流动起来,也使隐喻变得轻盈而变动不居,而具有多维映射性。例如西渡《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节选):

我们在放学路上玩着跳房子游戏
一阵风一样跑过,在拐角处
世界突然停下来碰了我一下
然后继续加速,把我呆呆地
留在原处……

叙事中的隐喻基础在于叙事的非客观性,即叙

事是记忆,是心理事件的独白,外部世界的事件在叙事中穿越了一个人的内心,记忆与历史已经浑然一体。上述诗句“被组织”在一个核心隐喻“世界突然停下来碰了我一下”之中,而这个隐喻不过是自然而然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组织的作用只是读者看见的效果,它像一盏灯在恰当的时候打开,映射到前后的句子,使所有的语言成分都具有了隐喻的功能,放学路上的游戏可映射天性的舒展,童年的自由与快乐可映射人类的天性,学童的轻快暗示了与之相反的社会凝重,现实的拐角处自然而然地指涉了人生的转折,“世界突然停下来碰了我一下”可映射学童对社会现实或历史语境开始有所反应,“留在原处”可映射学童与世界有了间离,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呆呆地”可映射其不能理解。也就是说,叙事性诗歌中的隐喻决不是孤立的,其必定是多维映射的,使整首诗(节)成为一个整体的隐喻意义场。

这种隐喻的延展性和多维映射性使现代汉语在当代诗歌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柔软、富有弹性,可以说,当代诗歌对现代汉语的贡献不是其他任何文类所能比美的。

“他性的自主”在语言意识的觉醒上对当代诗歌带来了上述积极的影响,但是同时也表现出了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这种虚弱属于人与语言的循环关系的虚弱。这也是世界范围内诗歌的共同特征,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的远亲奥斯卡·米沃什指出,20世纪诗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18]。中国当代诗人和诗歌的虚弱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诗人精神上的虚弱,1980年代以来诗人大体上摆脱了对政治力量的依附,但是又一边倒地依附于他者话语。在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每个诗人的内心是惶然不安的,精神上茫然,外表却“唯我独尊”,他们无一不标举某一世界诗人的诗歌理念,而他们就暂时安然地寄生其中。艾略特的“个性逃避”、瓦雷里的“纯诗”、奥尔逊的“高能放射器”、埃里蒂斯的“综合”、罗伯特·洛厄尔的“自白”、亨利·米修的“语言即另一维度的世界”、格里耶的“非意义”、尼卡诺尔·帕拉的“四反”、普列维支的“寓言式的简淡”、弗兰西斯·蓬热的客观……都能够成为中国当代诗人的安身之所。

另一方面是诗歌中的语言拜物教,完全归顺语言,强调语感的至关重要,全靠语感而成诗,诗意完全来自对语言表述的感觉,主张民间写作和口语写作的诗歌基本上都在上列。这一“他性的自主”的语言同样会造成语言的暴力,一种是温和的暴力,把一切日常语言用分行的方式阐释成诗歌,如“梨花体”和“羊羔体”诗歌;一种是机械的暴力,如像达达主义(dadaism)那样的自动化写作和写诗机器。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内在虚弱性与价值失范的表征。

语言本体论中的“语言”必须由“他性的自主”回归语言与人之间在存在本性上的联系,在人的存在精神中与语言的本体形成良性循环关系。如果在文本实践中诗人将自己完全让位给语言,便变成“诗人工具论”了,人与语言都是生命,哪一种工具论都是异化,都必然使诗歌陷入困境。当代诗歌中语言意识的觉醒勿庸多论,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更应当警惕,诗人的个人趣味、功利心理、超前的虚荣心等,把诗歌写作变成一种“为永恒而操练”的技艺,文本与语境严重割裂,诗歌标准丧失,反而依赖于阐释,这表明当代诗歌将面临一次深刻的语言观反思以及语言观的更新。

五、结语

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坛,经历了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现代语言观对诗人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改造,并逐渐转为各种诗歌群落内部自觉的语言认知追求,将语言问题推到诗歌艺术的中心地带。诗人既强烈地感到受制于语言,又找到了激活语言的全新技艺,不再讳言技巧与修辞,不再将语言当作纯粹的表达工具,更重视语言本身的艺术。在过去的诗学观念中,语言学上白话与文言的对立对于诗歌是根本性的,如今这一对立已失去意义,而语言观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替,成为当代诗歌最重大的成就之一。现代语言观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世界是语言中的世界,人通过跟语言打交道而间接地与世界打交道。可以说,语言是诗人的阿基米德支点,诗人通过语言,发明或创造了新的世界。语言观的现代性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美学标杆,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分野标志。诗歌的秘密在语言之中,诗人语言观的改变必然改变诗歌语言的面貌,从而带来不同文学特质的呈现,当代诗歌的合法性和成就全部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然而,当代诗人对现代语言观的理解与接受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既是因为受启发的来源不同,也是由于为诗人个人学养与兴趣所限,还可能是受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现代语言观的内容异常丰富,在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等领域都有特别的内涵,中国诗人的误读也势必难免,不过,误读同时也带来创造,其中价值尚待评估。严格说来,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观是西方与本土文化基因相结合的产物,道家语言观与西方本体论语言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话,甚至在其他古典的汉语语言观中挖掘出现代性的潜力也很大。在西方思潮的启迪下,当代诗人对汉语本质的重新审视,澄清了许多伪诗学问题,如格律问题、晦涩问题等,这理应是当代诗歌的成就内容之一。这种澄清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学界与诗界的持久争论的,因为语言观与诗歌写作之间不是无缝联接,只有随着现代语言观的不断内化与诗歌写作趋于成熟才有可能。所以,还有必要对当代诗歌中的语言观进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21世纪诗歌等的分期梳理,或者从特定诗人在不同时期里的语言观变化、不同诗歌群落的语言观差异等角度,来观察语言观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微妙关联。当代诗歌写作所表现出的内在虚弱性与语言观的问题相一致,诗人须保持人与语言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语言既非主体也非客体,工具性地使用语言与顺应语言“他性的自主”,都会导致诗歌内在的虚弱。

注释:

- ① 语词写作在这时决不再是一个修辞性的策略,而是思想本身。陈晓明认为上世纪90年的诗歌“试图用语词去挽留一个思想日渐单薄的时代”,这只是语言工具论视角下看到的现象。参见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3-110页。
- ② 易立新:《中西语言观对比研究》,《外语学刊》,2009年第5期;蒋邦芹、孙卫华:《可言说之存在与不可言说之道——海德格尔与老子语言观的比较》,《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 ③ 语象是与意象并列的诗歌艺术符号,作者在《语象和意象:诗歌的符号学阐释途径》一文有专门的探讨。
- ④ 西渡:《对于竖几个诗学命题的质疑》,2012年未刊稿。

参考文献:

- [1] 钟鸣.海神的一夜·序[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 [2] 郑敏. 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学价值[J]. 文学评论, 1996(4).
- [3] 于坚. 棕皮手记: 从隐喻后退[M]//棕皮手记.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248.
- [4] 周伦佑. 红色写作[J]. 非非, 1992(复刊号).
- [5] 蓝马. 前文化导言[J]. 非非, 1988(1).
- [6] 卡西尔. 人论[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 44.
- [7] 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48.
- [8]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9] 张卫中. 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J]. 文艺争鸣, 2004(3).
- [10] 李心释. 诗歌语言的反抗神话[J]. 文艺争鸣, 2012(10).
- [11] Heidegger, M. 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2009: 140.
- [12] 臧棣. 后朦胧诗: 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J]. 文艺争鸣, 1996(1).
- [1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14] 臧棣. 90年代诗歌: 从情感转向意识[J]. 郑州大学学报, 1998(1).
- [15] 臧棣. 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M]//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77.
- [16] 清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M]//臧棣, 萧开愚, 孙文波. 激情与责任.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371.
- [17] 西渡. 灵魂的未来[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32.
- [18] 米沃什. 诗的见证[M]. 黄灿然,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4.

责任编辑: 刘洁岷

(E-mail: jiemin2005@126.com)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Under the Linguistic Views

LI Xin-sh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englong poetry”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that we can accept the western thoughts of linguistic turn in literature. The three strands of extensive linguistic turn in western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areas in 20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rediscove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view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Poets battle with language in writing, and promote the media of language to inventive language, finally establish a view of language discovery which can indicate that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has completed the turn of language instrumentalism to language ontology.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ontology consists in circula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human, but there is inclination of autonomy of the other as “language adven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language, which has created extens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mapping metaphors with a new form, but has also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contemporary poetry. We should be on guard against poetic nihilism.

Key words: contemporary poetry; language view; poetics; language ontology